

# 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说明

2021年8月31日 0:28

路易·阿尔都塞

1976年12月

孟登迎 赵文 译

---

我在60 - 70年所写的那篇有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文本，通常被认为是一篇“**功能主义**”的东西。人们在我的理论草稿中看到了这样一种尝试，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仅仅用各种**功能**来解释**社会机构**，这样一来**直接**使得社会等同于履行着镇压功能的意识形态机构，因而局限于一种**非辩证**的解释，其深层逻辑就是排除一切阶级斗争的可能性。

但是我认为，人们没能对我那篇东西的最后一部分给予充分的注意，那部分明确指出了我的分析的“抽象”特征，而且也明确地把**我有关阶级斗争**的概念摆在了一个中心位置。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能够得到**发展的本质**，就在于**坚持阶级斗争相对于国家机器和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及功能的优先性**——与任何功能主义都不调和的优先性。

因为我们显然不能认为统治阶级对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体系——也就是说统治阶级的舆论效果（“**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语）——就是一个简单的既定事实，就是**只由那些机构所限定的一个体系**，能够**自动**复制同一阶级的**强制规则**或体现有着由其功能规定的一定目标的这个阶级的明确**阶级意识**。因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来都不是阶级斗争的既成事实，从来都不可能摆脱阶级斗争本身对它的影响。**

**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存在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复杂体系之中，它本身是漫长而艰苦的阶级斗争的结果**，资产阶级（仅以它为例）只有在这场斗争中满足一个双重条件才能实现它自己的目的，即它一方面要战胜**残留在旧有国家机器之中的先前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同时要战胜**寻求着自己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的新的被压迫阶级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借以成功建立对先前地主贵族的和对工人阶级的领导权的这种意识形态，不仅仅是通过对这两个阶级的外在斗争，而且——并且同时——也是通过克服资产阶级内部派系矛盾并把资产阶级团结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才确立下来的。

我们必须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从形式上来看，统治阶级必须生产它的存在的物质条件、政治条件和意识形态条件（存在就意味着再生产）。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可并非单纯的复制，并非简单再生产，甚至

也不是一劳永逸地被其自身功能确定下来的**既有机构的自动的、机械的扩大再生产**，它毋宁是一种斗争，争取让**早先的**、散碎而矛盾的意识形态要素在一整体中统一并复兴起来——而这个整体恰恰是通过对先前意识形态形式和新意识形态趋向的阶级斗争才得来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这场斗争是一场永无完结的斗争，总是不断重新开始，在任何时候都服从于阶级斗争。**

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统一过程总是“未完成的”、总是“必须重新开始”，这么说有几个原因。不仅因为先前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尚有残余，竭其所能疯狂抵抗（列宁称之为“习惯”）。不仅出于形成统治阶级团结的实际必要，这种团结一则是阶级各派系（商业资本、工业资本、金融资本）矛盾融合所必需，一则是在个别资本家的“特殊利益”之上表述他们“普遍（阶级）利益”所必需。不仅因为阶级斗争必须发动来反对正在出现的**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形式**。不仅因为生产方式的历史转变迫使**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要不断“适应”阶级斗争**（古典资产阶级的法学意识形态目前正被专家治国论的意识形态替代）。而且还因为**实践具有物质性和多样性**，由之而来的“自发的”意识形态必须被不断整合。这一庞大而矛盾的任务从未彻底完成过，而我们也怀疑葛兰西和克罗齐提出的乌托邦理念的那种“伦理国家”模型是否会存在。**正如阶级斗争永不会熄灭一样，统治阶级争取使既有意识形态要素及形式统一起来的斗争也不会熄灭。**这就是说，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即便它就是自己的功能——**永远无法彻底克服它自身的矛盾，这些矛盾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

我们因而可以由**阶级斗争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优先性**这个论点得出另一个论点，后者是前者的直接结果：**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必然是阶级斗争的场所和实际诉求，使决定着社会结构配置的一般阶级斗争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机器中延续下去。**如果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就是推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那么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存在着**抵抗**；如果说存在着抵抗，那么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存在着斗争，而且这斗争归根到底都是**阶级斗争直接或间接的、有时近但更多时是远的回响**。68年“五月事件”生动地说明了这个事实，并且让直到那时为止一直喑哑无声并被压抑着的一种斗争变得可见。但这些事件在以造反形式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里（特别是在学校机器里，继而是在医疗机器里，在建筑这种机器里）让一种**直接的**阶级斗争变得可见的同时，也多少模糊了那个决定了眼前这些事件的根本，即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历史构成**和矛盾再生产所固有的阶级斗争特征。没人从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和政治视角“体验过”68年五月。所以，我想必须提醒一下人们，如果你要理解**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里阶级斗争的真相**，并且把造反控制在合适的范围，那么你就得采用“**再生产的观点**”，这个观点把阶级斗争视为一个总体过程，而不把它理解为个别对抗的总合或局限在这个或那个“领域”（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对抗；这个观点把它理解为一个**历史过程**而不是压制或**直接反抗**引发的一系列事件的结果。

在提醒人们注意这些观点的时候，我发现，我被指责为“功能主义者”，或被指

责说对促生了我们的阶级斗争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做了有利于有关此类过程的机械观的“系统的理论”解释，这的确是难于理解的。

## 二

针对我的其他一些反对意见与政党，首先是与革命政党的特性有关。简言之，有一些人总是倾向于认为我有这么一种思想，即把**每一个**个别政党都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这将使每个政党彻底被**封死**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体系”之中，服从这一“体系”的规律，因而排除了体系中革命政党的一切可能性。如果所有政党自身都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服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那么革命政党，被化约为它的“功能”的革命政党，就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我从没写过一个政党就是一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可我说过**完全不同的话**（非常简单，我得承认），那是说政党只是一个**特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即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这么说吧，这些**组成部分**在统治阶级的“宪法政体”（最高法院、旧制度君主政体等等之下的“基本法”，“自由主义”阶段的资产阶级之下的代议制政体）中**“实现”统治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

我所提出的概念应该从**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角度去理解，我怀疑有人没能正确领会这一点。要更好的理解它，你就得把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镇压性）国家机器**仔细地区分开来。

（镇压性）**国家机器**的整体即便是充满矛盾的，也仍旧要比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总体强大得多，那么（镇压性）**国家机器**是由什么构成的？国家机器包括国家元首、政府、行政部门（作为执行的工具）、军队、警察、司法系统、法院及其附属机构（监狱等）。

在这个整体中，我们必须区分出我称之为**国家政治机器**的东西，其中包括三个方面：**国家元首**，**国家元首直接向其说话的政府**（目前在法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中存在的政体）和**行政部门**（它**贯彻**政府的政策）。**国家元首**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团结**，其所代表的这种权威能够保证资产阶级的普遍利益高于该阶级个别成员或个别集团的特殊利益。吉斯卡尔·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在1978年大选时一再从良心出发表明自己的立场并大谈左派将如何当政，但实际上还是坚持必须“保卫法国的自由”，也就是**资产阶级的那些自由**。政府（目前直接由国家元首领导）执行统治阶级的政策，下辖于政府的行政部门具体贯彻这些政策。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表明了**国家政治机器**存在的区分，看到**行政部门**也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即便它被为**“共同利益”服务和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这种意识形态包裹着。这里不存在个人意图，也没有例外：**行政部门的职能和资产阶级政府的政策**即阶级政策具有完全不可分离的一致性。**高级行政部门**被委以执行具体政策的重任，因而就扮演了**直接的政治角色**，而**行政部门**的整体就开始日益承担起**分区控制（quadrillage）**的职能。行政部门如果不同时被委以对个体或群体执行情况监督的职责——或将那些拒不服从的个体、群体移交镇压部门或对之进行起诉的职责——它就无**贯彻资产阶级政府的政**

策。

国家政治机器（国家元首、政府、行政部门）是（镇压性）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这样理解的时候，就有可能将它合法地与国家机器中区分出来。

现在我们触及到了这个关键的部分：我们必须在**国家政治机器**（国家元首、政府、行政部门）和**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作出区分。前者属于（镇压性）国家机器，而后者属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个术语让我们听到了什么？一定社会形态的“政治制度”或“体制”。比方说，和所有同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资产阶级相似，法国资产阶级即便在阶级斗争的危急形势下创造过别的政体（波拿巴一世和波拿巴二世，君主立宪，贝当的法西斯政体），但总地来讲它只承认**议会代表的政治体系**，这种政体通过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实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可以是一种对“人民意志”进行代表的特殊模式，“人民意志”由选出的（或多或少具有普遍代表性和直接投票权的）议会成员代表，他们对由国家元首或议会指定的政府的政策进行**问责**。然而众所周知，政府de facto [事实上] 掌握着数量大得惊人的手段来**错误地解释并规避责任**（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在这个机器中占有优势地位）；这些手段从一开始就昭然若揭，除了一些适度的**胁迫方式以及对大众媒体的控制**，还有**伪造所谓的普遍代表性和直接投票权**，再就是诉诸现代议会规则（人口普查机制、禁止妇女和青年参与选举、不同层次的投票权、有着不同选举基础的两院制、“分”权、对革命政党的权利剥夺，等等）。这就是**事实的真相**。但是，我们之所以可以说“政治制度”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由于有别于这“特定”真相的**虚构**，正是由于这虚构，这个制度的组成部分以及它运作模式的规则，其基础就是有关投票个体的“自由”与“平等”的意识形态，就是“构成”人民的个体对人民代表的“自由选择”——它尤其借助这样一种理念，即每个个体为了自己所创造的政治也就是国家要履行的政治。正是在这一虚构的基础上（而国家政治归根到底是由阶级斗争中统治阶级的利益决定的），“**政党**”才得以组建，这些政党被认为代表并表达着有关国家政治的众多分歧的选择。因而，每个个体也就能够通过为他所选择的某个政党投票的方式“自由地”表达他的意见（如果它的选择不被断定为非法的话）。

请注意，在政党背后存在着一定的现实。说白了，它们一般而言代表着敌对阶级的利益和阶级中敌对派系的利益，或者是社会各阶层的特殊利益，这些阶层在阶级冲突之中总是倾向于把自己特殊利益凌驾于其他利益之上。正是由于这一现实，不论政治制度有多少干扰手段或两面派手段，根本阶级的相互对抗性最终**能够**浮现出来。我之所以说“能够”，这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些资产阶级国家（美国，大不列颠，联邦德国，等等），它们的阶级斗争的政治发展**没能超越议会代表制的门槛**：在这些国家里议会中的对抗很少反映甚至完全扭曲真实的阶级对抗。资产阶级受议会制度的保护，完全是在它们自身内部绕圈子，只是在踏步不前。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即**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阶级斗争可能获得一定程度的权力**，使得资产



阶级开始害怕“普选的裁决”（法国，意大利），即便资产阶级尚能动用大量手段以颠倒这一裁决或使这一裁决失效。我们不禁想起了法国人民阵线时期的代表议院：资产阶级只用了两年时间便削弱了议会的多数，然后便按照代表们的协议把它移交给了贝当。

至此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用事实和结果来质证议会政体的种种“原则”的话，没人能怀疑它的意识形态特征。

所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法律意识形态和几世纪以来传播开来的哲学意识形态以及道德意识形态，都声称对“人权”作出了如下“证明”：每个人在政治上都有选择自己的思想和阵营（他的党派）的自由；所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声称这一“证明”的根本理念——尽管它归根到底只是一种幻觉——，即所有社会都是由单个的个人组成的（马克思却说：“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sup>[1]</sup>，而是由阶级斗争中各阶级构成），普遍意志就在投票的多数机制的投票箱里，最后，正是这种由议会各党派成员代表的普遍意志决定着国家的政治，尽管后者实际上永远只代表某阶级即统治阶级的政治。

再明显不过的是，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一个要素并完全与后者一致：这一要素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随处可见（即便后者在近十年中逐渐转变自身）。如果我们看到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基质”是资产阶级法权运作模式不可或缺的法律意识形态，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如果你遇到了随处可见的[观念]，那么你就是碰到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一个“证明”到另一个“证明”的永恒循环参照——从法律意识形态的“证明”到道德意识形态的“证明”，再从后者到哲学意识形态的“证明”，再由之到政治意识形态的“证明”——，借此每部分意识形态“证明”都得到直接的证实，以便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各种实践中把这种证实强加给单个的个人。自由和平等的人权意识形态（选择自己观点和代表的自由，投票箱前的平等）最终产生出——并非由于“观念”的力量，而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它的意识形态机器，人权的政治意识形态也借以形成了一个具体形式。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批判家之外的所有人来说，该意识形态已经得到“证明”，可以在没有明显胁迫的情况下为选民或至少是大多数选民所接受。我们在这里显然是与一种机器在打交道，因为它就建立在一整套物质性的被组装起来的装置之上，这些装置有选举名单、选票、投票亭、竞选活动以至于由此而产生的国会。而且我们还明确地是与一种意识形态机器在打交道，因为它不靠暴力，“相当独立地”靠着其参与者的“意识形态这一基础”而运行，它的参与者接受其规则并履行着他们，因为他们真心重视它们，确信一个人必须“履行自己作为一个选民的责任”，这就是常规。服从和同意在这儿达到了吻合。资产阶级所强加的这种“证明”被选民当作“证明”接受下来：他们认为自己是选民并参与到这个体制当中去。他们“遵守游戏的规则”。

如果这一分析正确，那么你就不能坚持说——就像有人要让我完全为把革命行动的全部可能性排除在外一种理论负责而“草率地”做出结论那样——所有党派，包括工人阶级党派在内的所有党派作为政党各自都是一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们共同整合起了资产阶级政体因而也就不能从事它们自己的阶级斗争。

如果我所说的是事实，那么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也就是说，政党的存在决不排除阶级斗争，而是以阶级斗争为基础。如果说资产阶级总是竭力行使它对工人阶级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导权，这也正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方式，资产阶级只有在工人阶级政党被它欺骗的条件下才能取得成功；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受到胁迫（1914 - 1918 年的神圣联合[21]），或者就是被“收买”，要不就是工人阶级的党的群众基础偏离革命目标以捞取物质利益（工人贵族），再就是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投降（修正主义）——都会使这种情况发生。

### 三

如果我们对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党即共产党进行考察，这些阶级斗争效果就更为明显。因为这些党是工人阶级的斗争组织，所以它们在原则上（之所以说原则上，是因为它们会滑入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与资产阶级利益，因而与其政治体制完全对立。它们的意识形态（即他们招募它们党员的基础）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敌对。它们的组织形式（民主集中制）使它们与资产阶级政党，甚至与社会民主党或社会主义党区别开来。它们的目标不是要将自己的行动受制于议会竞争，而是要将阶级斗争扩展到整个工人阶级，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进而扩展到意识形态领域，而且要采取属于它们自己的斗争形式，必然与每五年将自己的选票放在投票箱的那种方式截然不同。**在所有领域而绝非议会之内进行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这才是共产党的任务。它的真正任务**不是“参与”政府，而是推翻并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权力。

有必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大多数西欧共产党今天都说自己是“参政党”。即便它们偶尔参与政府（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这么做是对的），**但一个共产主义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定义为一个“参政党”**——无论我们所说的政府是在资产阶级的支配之下，还是在无产阶级的支配（“无产阶级专政”）之下。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共产党永远不会为了“管理”资产阶级国家事务而进入资产阶级国家政府（即便这个政府是广泛联合的“左翼”政府，致力于推行民主改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即为了加强阶级斗争并为推翻资产阶级国家而做准备，它才进入政府。而它也不可能在如下前提下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即它的真正任务就是“管理”这个国家的事务，**但实际上它必须为国家的消亡做准备**。因为如果它投入全部精力去进行那种“管理”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党实际上让自己和这个国家融合在一起的话——正如我们在东欧所看到的那种情况，那么促进国家的消亡就是不可能的。所以共产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作为普通的“参政党”去行事，因为做参政党就意味着做国家的党，这无非就是说要么为资产阶级国家服务，要么就是使无产阶级专政永恒化，而彻底偏离其促进国家消亡的任务。

可以看到，一个革命的党坚持在**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获得稳固的地位，以便让阶级斗争的回响能够在议会中被听到，或者它因为形势有利于促进阶级斗争而“参与”了政府——即便如此，它也不应由它在选举议会中的位置或由通过资产阶级**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实现的意识形态而被定义。实际上，共产主义党有着彻底区

别于资产阶级党的“政治实践”。

资产阶级党掌握着资产阶级的资源和支持，如资产阶级经济支配权的、剥削的、国家机器的以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全部资源和支持。它要存在，首先不必为了赢得大众对它理念的支持而团结大众：最重要的是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本身承担了这项宣传和拉拢的说服工作，它保证了资产阶级党的群众基础。就资产阶级这方面而言，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优势是绝对有把握的，而且由来已久，以至于“选择”在“通常”情形下是自动化的，丝毫不受党派和资产阶级各派系更迭的影响。所以，资产阶级党只需有效地迅速地动员起来组织好它们的选举大战，就可以争取选民认同并收获胜利果实了。

因此，资产阶级党根本不需要某科学理论或坚实学说就能生存下来：它只需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储备中借点思想就足以集合起出事先就由于恐惧或为利益计而被说服的追随者了。

工人阶级的党不能为自己的党员提供任何东西：既没有报酬丰厚的闲职也没有物质利益，与此相比，资产阶级恰恰就是用这些来收买他们的成员，以防他们在支持的时候迟疑。工人阶级的党如实表现自己：它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组织，它的力量来自被剥削阶级的本能、科学的理论和党的章程所允许的自愿拥护者的自由意志。它把拥护者组织起来，领导一切形式的阶级斗争：（与工会组织相联合的）经济方面的、政治方面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它确定路线和实践的基础不只是被剥削工人的反抗，而且还有各阶级间的**权力平衡**——多亏了由一切阶级斗争经验而丰富起来的科学理论原理，它才能以“正确”方式分析这种权力平衡。所以说，它最大限度地从每一方面——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思考对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方式和力度。只有在这一“路线”基础上，它才能对既有效又“正确”地进入左翼政府做出判断，从而在其中为自己的目标进行阶级斗争。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它都使运动的眼前利益服从于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它使自身的策略服从于共产主义的策略即无阶级社会的策略。这些至少就是“原理”。

只有在这样一些条件下共产主义者才能说他们的党是完全区别于资产阶级党的“新型党”，才能说他们自己是彻底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客的“新型战士”。他们的政治实践，非法的也好，合法的也好，议会内的也好，“超议会”的也好，与资产阶级的政治实践毫无共同之处。

有人现在可能会说，共产党，像所有的党一样，也在某种**意识形态**——它所说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上组织自身。当然如此。即使对共产党来说，意识形态也起着把一个特定社会团体在思想和实践上**统一**起来的“粘合剂”（葛兰西）的作用。同样，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意识形态“把个人传唤（interpelle）为主体”，说得更确切一些，传唤为**战斗**主体：人们只需对共产主义党有点体验都能发现这种机制和动力，这一机制和动力基本上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决定着个体的命运，但同时也要考虑到这种意识形态的“规则”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是存在着矛盾的。人们所说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绝非无产阶级“自发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的“成分”（列宁）在那

里总和资产阶级成分混合在一起，而且往往服从后者。因为，要作为一个意识到自己的整体性并在战斗组织中积极发挥作用的阶级而存在，无产阶级不仅要有经验（一百多年来它所进行的阶级斗争的经验），而且还得有**客观认识**和马克思主义学说所提供的指导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照亮了这些经验，在这个双重基础上，它们才构成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构成了人民大众的意识形态，才能够在阶级斗争的组织中使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团结起来。**它因而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意识形态**：说是意识形态，因为它与其他所有意识形态一样都在群众基层起作用（把个人传唤为主体），但同时它又充满着被科学分析原理照亮了的历史经验。如其自身所示，它形成了一种将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熔合在一起的形式，这种熔合却又不可能没有冲突和矛盾；因为，这一熔合形式发生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特定时期特定存在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使它得以形成并能够存在的党之间，它是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所不知晓**的一种熔合形式，虽说马克思主义学说迄今一直还被这一熔合采纳。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这儿只充当经典权威，就是说一种识别标记或教条，说到底，为了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实用主义和宗派主义意识形态的缘故，马克思主义学说也可以干脆**完全消失**。不需长篇大论我们在这儿也能认出带有斯大林时期的印记的那些党在当前的处境，并得出如下结论，即当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组织中滋生开来时，“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也要取决于能让无产阶级保持自身统一性和行动原则的阶级斗争。

一种意识形态：当然。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不仅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既然每个阶级实际上都在一定的绝非任意的意识形态之中辨认自身，也就是说在植根于其**策略实践的**，能统一并指导该阶级从事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之中辨认自身。我们知道，封建阶级出于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分析的种种原因在**基督教的宗教意识形态**中辨认自身，而资产阶级以相似的方式，至少是在其阶级统治和帝国主义最后发展阶段之前的那段时期，在**法律的意识形态**中辨认自身。而工人阶级，就其本身而言，即便它可以对宗教的、道德的和法律的意识形态要素非常敏感，但它首先是在**具有政治特征的一种意识形态**中，不是（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的意识形态而是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政治的意识形态中辨认自己的。这是为了消灭阶级和建成共产主义而进行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一开始具有自发形式（乌托邦社会主义），随后则在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熔合中得以深化发展，而只有马克思主义学说才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核”。

显然，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并非“知识分子”个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工人运动**指示**的结果。工人运动之所以会采纳这种意识形态，乃在于该阶级在其中认出了自己的存在：唯其如此我们才能解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何以能完成这样一个奇迹——为无产阶级度身定制了这么一个学说。它也并非考茨基所认为的那种被“灌输”进工人阶级当中的东西。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如果没有使自己的学说建基于理论的阶级立场之上，就不可能形成他们的学说——他们理论的阶级立场是他们与自己时代的工人运动建立起有机联系所产生的直接结果。实际上，知识分子当然可以通过巨大的认识努力构想马克思主义学说，但只有在**工人运动内部并从其最隐秘的内核**出发才能做到这



一点。马基雅维利就说过，“要理解君主他就得是人民”。知识分子的出身不是人民，他必须成为人民才能理解君主，而只有参与到人民的斗争中去它才能做到这一点。马克思做到了：通过最早的无产阶级组织中进行斗争，他成为了“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葛兰西），也只有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理论立场的基础之上，他才能“把握”资本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学说从外部灌输进来这个坏的问题提法所以应该变成这一形成于工人运动内部的学说在工人运动中传播的问题。当然，这种“传播”是经历了大起大落的相当长期的阶级斗争的结果，尽管对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造成了戏剧性的分裂，但这种传播依旧继续着。

我们可以用阶级斗争高于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优先性的论点概括这里对革命的党的性质的分析的核心精神。一个以共产主义党面目出现的党，一旦热衷于通过选举游戏实现成为议会代表的权利，那么**从形式上讲**，它也可以以其他党的面目出现。一旦这个党出现在议会当中或“参与”了一个广泛联合的政府，那么**从形式上讲**，它也能以“遵守”**政治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游戏规则”的面目出现。同样**从形式上讲**，它甚至还能以如下面目出现：它认可了这些“游戏规则”以及靠着并通过它们运转起来的整个意识形态机制——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机制。但是工人运动的历史给了我们足够多的教训，革命的党只要“加入这个游戏”并且有效地使自身“融入这个游戏”，那必定会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下为了阶级联合而放弃阶级斗争。就阶级斗争的效果而言，“形式上”这么一来只能变成“实际上”。

一直存在着的这种风险提醒我们注意工人运动的形式必须服从的前提条件：**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先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支配性**。如果你认为阶级斗争只是反抗社会不公正，不平等甚至是资产阶级剥削的**工人阶级造反的结果**，一句话，把阶级斗争简化为在**一定剥削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所从事的阶级斗争**，进而简化为资产阶级对这种斗争的回应，那么你对阶级斗争所抱有的看法就是错误认识。这里被遗忘的恰恰是：剥削的条件是在先的，剥夺无产者的状况之形成过程正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本质形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支配性的**。应该把原始积累的全部历史当作**资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对工人阶级的生产**——这种阶级斗争也制造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条件。

如果这一论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不难清楚地看到为什么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从一开始就支配着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为什么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需要那么长时间来锻造自己的形式并找到属于自己的存在方式，为什么阶级斗争就其根本而言是不平衡的，为什么阶级斗争在资产阶级那里有着与无产阶级不同的实践形式，以及为什么资产阶级要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制造**那些形式**以提前取消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并使之服从于自己。

无产阶级的自治，这是它所必需的大策略，也反映了这一条件。如果工人阶级服从资产阶级国家的支配，受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胁迫作用和那种“证明”的支配，那么它就无法赢得这种自治，进而无法获得条件去摆脱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无法让自己和它划清界限，无法创造属于自己的组织形式和行动方式，因而也就无法创造自己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一断裂和彻底划清界限的特殊

之处在于，它只有在长期不断的斗争中才能完成，而这斗争又不得不认真对待资产阶级的那些统治**形式**，并在**属于自己的统治形式的内部**与资产阶级展开战斗，而且还要确保不能“拘泥”于自己的这些形式——因为它们实际并非中性“形式”，而是创造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机器**。

正如我在1970年的研究笔记中所说：“因为，如果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真的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必然**由以得到实现的**形式**，代表了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必然**由以进行较量和对抗的形式，那么，各种意识形态就不是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当中‘出生’的，而是来自在阶级斗争中搏斗着的各社会阶级：来自他们的生存条件、他们的实践、他们的斗争经验，等等。”

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存在条件、实践（生产的和政治的实践）和形式，与资本家阶级的和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存在条件、实践（经济的和政治的实践）和形式毫无共同之处。因此就出现了对抗的意识形态，它们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样，是**不平衡**和**不相同**的。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并非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直接对立面、反面或颠倒，而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是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的批判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尽管它的历史几经大起大落，但由于已经具有了这样的价值，即已然在工人阶级斗争的组织和实践中得到了实现的价值，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已经勾画了社会主义过渡期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侧影，并因而展现了共产主义条件下废除国家并废除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某些前景。

注：译自英刊《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1983年12月第4期（总第12期），由Jeremy Leaman译自德语版《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e und ideologische Staatsapparate, Hamburg/Berlin: VSA.1977, p.154-68）。中文版见《美术馆—全球化语境中的博物馆经济》（总第12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

[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 - 1858年草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20页。——译者注

[2]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的战时内阁，共和社会党、左翼联合党、联合激进党、共和联合党和左翼激进党、统一社会党在在战争的特殊形势和“保卫法兰西”的口号下共同组阁。——译者注